

转型文库

丛书主编 冯绍雷

转型时代的 帝国研究

饶淑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 型 文 库

丛书主编 冯绍雷

转型时代的 帝国研究

饶淑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饶淑莹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0
(转型文库/冯绍雷主编)
ISBN 978-7-208-09242-6

I. ①转… II. ①饶… III. ①帝国-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8446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

饶淑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236,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42-6/D·1716

定价 32.00 元

丛书总序

最近四十多年来发生在欧亚等地区许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大概是近半个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与各国的国计民生最相关联,因而也是令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转型问题不可避免地是充满着争议的学术领域之一。所以,对于转型问题的研究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今国际国内学界各个领域所重视的对象。

一

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叫法,最为普遍的叫法就是“改革”。但是“改革”一词原来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一般说来,前者意味着是在基本宪政制度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体制变化,而后者指的是改朝换代式的基本国家制度的更替。但是,最近三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体制变革似乎打乱了这种词义上的区别。体制变迁既可以发生在宪政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之下,例如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推进的改革;同时,也可以发生在社会基本制度发生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当中,就像伴随着苏联解体所出现的这一场先叫“重构”、后来又叫“改革”的制度变迁。发生在俄罗斯的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如此重大变化的转型,尽管其形式是那么激进,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却认为这场变革的内容中还是透漏出了很多的传统基因。而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渐进性、局

部推进式的改革,从形式上看是比较稳健的,但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解:改革就是革命。

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所包含着的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变革本身已经说明其内容之复杂、其形式之多样、其背景之深远,而这样的复杂多样的体制变革却集中发生在最近这三四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且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足见其非同一般。根据不少国际学者的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制度转型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欧洲南部首先开始的。当时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先后发生的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的变革引发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转型进程。在此之后,大体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人文、地缘、经济,以及传统纽带的联系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东亚差不多同时大规模地开始了从军人专权或者威权体制向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进程,实际上更早就开始了。最早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二战刚刚结束时在南斯拉夫地区出现的变革过程。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于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苏联关系上)寻求各种类型的“自治”的努力相当直接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而50年代中期先是改革,而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变又深深地影响了6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在大多数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断断续续地延伸到80年代后期。紧接着的就是令整个世界措手不及的先是东欧、后是苏联的以政治剧变为标志的冷战的终结。

出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并且是有着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影响的体制转型过程,大体上有着相似的社会历史内容,那就是从传统的权力较为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形式可以是军人政权、政治威权体制,也可以是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的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转换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种族肤色、地理方位,包括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等各种差别,显示出五彩斑斓、声势浩大的局面。

按照科尔奈的说法,发生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的体制转型进程,是自世界历史告别中世纪,进入近代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历史的变革。这场体制转型所具有的巨大规模和深刻意义唯有工业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这样的大变革才可以比拟。如果从所涉及的国家来说,从南欧到拉美、从东亚到东欧、从非洲到南亚,各地大多数非欧美国家都被卷进了这样一个民主化、市场化的宏大进程中,其规模与气势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从变革的深度和影响力来说,一方面是激发了这么一大片国家和地区的活力,提升了它们的实力、效率和发展水准,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面貌,使之在当今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的欧美列强抗衡的格局;另一方面,由这场大变革所引起的冲击和动荡也足以令人瞠目,其中最为让人料想不到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包括东欧的剧变。

这样的一场大变化,除了少数地区和国家,基本上是在兵不血刃的和平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也就更多地留下了关于体制与社会转型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与意见,迄今难以统一。这一时期各国各地区内部体制转型进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伴随着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外部的宏大过程:全球化。现在研究还没有能够搞清楚,到底是20世纪末叶的全球化过程引发了各国内部的体制转型,还是相反,由各国体制变迁推动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求解的“蛋生鸡”与“鸡生蛋”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现象互相作用而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

对于这样一种以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即使在有着丰厚学术基础的西方,也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其原因就在于体制转型本身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不久的历史过程。

在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学科分类去描摹这样的一个全新客体的情况下,在西方,有人将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干脆称之为“转型学”。但是对于转型研究的学理背景、学科基础,乃至于范畴体系和学科方法则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认为,对于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应该以传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导来展开研究,但是,传统经济学主要从事静态的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体制转型过程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传统政治学受到经济学较大的影响,多半程度上更集中在稳定态制度的研究,较少有像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样的作品。近来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体制转型的研究应该是一门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的门类。从现象上说,体制转型涉及政治博弈、经济运行、历史背景、文化遗产,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但是如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用来解释和分析纷繁复杂的转型现象,还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不是来自各种不同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们坐在一起,就能够形成多学科研究的,而是必须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方法上有更多的创设才能够成其事。

与转型学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按照科尔奈的说法,转型研究不太关注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的考察,而是主要集中在一些宏大问题的讨论,以及各个转型领域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的研究之上。这一观点又为我们从事转型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即,转型研究是远远超越了一般学科意义上的知识门类,而是一个反映当下过程动态特性,也因之而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的一个知识门类,但是,这样一种全新知识结构的形成需要相当完备的信息系统的支撑,特别是对于各学科知识积累的汲取和荟萃,这是需要长期艰苦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事情。

总之,相对于根基深厚的传统学科,犹如历史学、哲学、文学这样枝叶繁茂的学术构建,转型研究的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然而,当下急剧变动中的社会对于理清自身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对于这样一场如此激荡人心的社会大变动的深入分析与认知,都迫不得已地将转型研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特别是需要将转型研究置于一个

认真合理地构筑的知识框架之下。于是,就有了总结和整理迄今为止的有关体制转型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并尽可能地将其系统化,在切实地推进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将其逐步地理论化的诉求。

虽然理论和实践的积累都还相对薄弱,但是,这种转型研究已经在各个学科方向上迅速地铺陈开来。

三

对于转型问题研究较为直接的兴趣和需求更多地是来自关乎转型进程本身的问题。这里包括有关转型的发生及其背景、转型的进程与周期、转型的速率、转型的功能与效用、转型的比较研究、转型成效的评价标准等问题。

转型这一现象之如何发生,以及转型发生时的状况始终是一个使无数学者着迷的问题。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解释,20世纪末叶体制转型具有重要的共同背景:其中包括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世界性的经济增长、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外部行动者的改变立场,以及“滚雪球”效应。而按照林毅夫的判断,转型之所以发生,更多的在于社会思潮所起的作用,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秋风扫落叶般的席卷全球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林毅夫所指现象的意义。但是,对于任何思潮而言,如何具体地作用于转型实践,还是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才能理清脉络。包括对于“新自由主义”一类思潮,究竟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影响,恐怕也不是简单的“扣帽子”甚或大批判所能说清楚的问题。

转型的进程与周期问题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这里包括的问题是体制转型进程是否有一个一般的模式;是否只能够以政治,或者只能够以经济,或者只能够是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开花为起点;是否必须要承受改革初期的大规模经济下降的磨难等等。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焦点,是所谓的“第二次转型”问题,也即人们发

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正在出现一个对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的不同程度的调整和逆转,以克服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次转型”所带来的“体制陷阱”。比如,在俄罗斯就出现了普京式的部分地加强中央权力以维持稳定的重大调整,这一现象也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中出现。于是就产生了改革要以怎样的进程与周期推进才能够取得效用的问题。

体制变迁中的绩效评价问题,到底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是以体制建设的进度来加以考察,是以执政党的选票多少来考量,还是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实际程度来加以区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时期,乃至于一届政府对于这样的绩效评价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学者们关注这样的评价,是有着一系列的理论考量的:不能够以牺牲当代来服务于将来,但是也不能够只是以民粹主义的态度取悦于民众,而不顾及未来的长远发展。

包括体制转型的进程是否能够相互比较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争论问题,而且,也是决策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是相互借鉴的前提。回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前期,我国学术与决策界对于苏联东欧地区的改革经验与教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能够在当时我国自身实践经验相当匮乏的背景下,从彼处取经。当时这种相互比照借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我国与上述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未曾料到的是,当我们还想继续从苏联东欧的经历中寻求知识和取得灵感的时候,它们自身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比较研究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提瞬间消失了。当然,所谓的转型比较研究还包含有更加广泛的内容。比如,在南欧、拉美、东亚、东欧等地区各不相同的转型问题究竟是否存在着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学界并未就此得出一致意见。

这样一类转型问题的定位与界定、本色与特性、进程与周期、速率与节奏、绩效与评价、比较与借鉴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属于转型本身问题的研究。

四

对于转型问题的另一类研究是有关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有关体制转型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有关转型进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有关历史传统与当代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转型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超出传统学科领域,多半是由于存在着对于这一类宏大问题的考量;同时,这也是转型研究不仅富于理论性,而且,还富于相当浓厚的战略与决策特性,甚至于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重要背景。

对于体制变迁与外部环境相关性的观察已经非常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国际学界的重点话题领域。用我们习惯的话语来说,这个问题研究的就是改革和开放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经常会习惯地指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动开放。好像改革与开放之间只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实际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开放过度又会成为阻碍体制变迁与破坏稳定的重大灾难。比如,1997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东南亚国家金融体制过多地受到外资侵扰,以及随后多年的动荡,反映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国际学界,国内体制变革与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关联性问题已经受到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广泛的关注。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惊呼,当今国际秩序正在被“欧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中国与俄罗斯的权威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这样的区分重新一分为二,似乎两相对立的冷战又要重新点燃战火;而自由派人士则依旧悠然自得于“当今国际体制如此完备而富于弹性”,因而足以吸纳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加入这一体制。在笔者看来,恐怕这两种趋势都未必成为将来的现实,而正在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与国际体制的互动才是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更为可能的选择。无论上述的哪一种观点都表明了,体制变迁问题已经与国际体制的重构问

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转型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敏感,但也是相当基本的问题,便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之,就是政治体制与经济成长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将这一问题表达为政治民主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比较普遍的社会思潮是将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认为只有同时实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近年来,来自波兰,但却在美国长期任教的普热沃斯基经过了对上百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他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在中短期的背景之下,无法对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成长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政治民主化了不一定能够确保经济的增长,相反,经济发展了,未必就一定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虽然,就像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普热沃斯基依然是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前景问题寄予厚望,但是,他经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相当务实的结论却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关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与当代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至少目前有这样的几种说法。一派意见强调政治文化的继承性,认为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代制度变迁,但是另一种意见强调传统文化与当代变迁之间的断裂性,并认为,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观察当代制度变迁,难以解释为何同样一种文化,在某一时段会倾向于变革,而在另一个时段,同样一种文化会拒绝这样的变革。

几十年转型研究的实践对于这样一类宏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实证材料,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一整套理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一步到位式的、政治经济全方位推进的,以及激进的改革路线只是获得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结果;事实表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式”的稳健型改革相形之下却获得了大大的成功。虽然,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提供一个完备的模式,但是,实践为理论的构建创造了前提。

五

再有一类转型研究是关于转型进程中的“范畴研究”。其中既包括像转型中的“要素”或者“现象”问题的研究,比如,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体制转型中的作用、官僚和体制转型的关系问题、转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还比如,转型中的腐败问题、体制转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等问题。也包括更加广泛意义上与转型问题相关的范畴问题的探讨。

在转型现象千变万化,尤其是其结果与进程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的时候,任何抽象理论的推导都比不过实践的丰厚。因此,笔者建议,在对于转型现象还需要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抓住几个要害问题,从内容较为有限的“范畴”的角度着手,形成对于某一领域的转型问题的深入洞察,这可能是研究转型问题较为容易的突破口。

本丛书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的同仁在多年从事转型研究以后初步成就的一个汇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选列了事关转型研究的一系列关键性范畴。比如,我们选择了“帝国”、“后现代国家”、“联邦主义”等范畴作为切入口探讨转型国家的国体与政体问题;我们还选择了“移民”、“选举”、“第二次转型”等范畴讨论典型的转型现象问题。类似的题目我们还将继续作出进一步的选择。

但愿从范畴角度的伸展能够为总体的转型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新的方向,这是我们的一项新的尝试。

冯绍雷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导论 帝国研究的学术源流	1
第一章 关于帝国的理论研究角度和“帝国”的涵义	21
第一节 关于帝国的理论研究角度	21
第二节 与“帝国”有关的一些概念问题	34
第二章 系统的方法:多米尼克·列文的帝国研究——《帝国: 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	58
第一节 学术内容与结构	58
第二节 列文对帝国的兴起、维系和衰落的分析	63
第三节 列文对帝国研究的贡献	87
第三章 帝国的网络:亨利·卡门的帝国研究——《帝国: 西班牙是怎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1492—1763)》	100
第一节 学术内容与结构	100
第二节 卡门对16世纪至18世纪西班牙帝国的兴起 和扩张的阐述	103
第三节 卡门对帝国研究的贡献	121
第四章 帝国的道德性:尼尔·弗格森的帝国研究——《帝国:不列颠 世界秩序的兴亡以及全球性大国应汲取的教训》	128

第一节 学术内容与结构·····	128
第二节 弗格森关于英帝国的兴起、治理和解体的阐述·····	132
第三节 弗格森对帝国研究的贡献·····	145
 第五章 结构理论的角度:亚历山大·莫特的帝国研究	
——《帝国的终结:帝国的削弱、崩溃和复兴》·····	155
第一节 学术内容与结构·····	156
第二节 莫特关于帝国衰落和解体的结构理论·····	160
第三节 莫特对帝国研究的贡献·····	178
 第六章 后现代的阐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研究——《帝国》···	
第一节 学术内容与结构·····	188
第二节 哈特和奈格里的后现代“帝国”理论·····	191
第三节 哈特和奈格里对帝国研究的贡献·····	198
 第七章 当代帝国研究的结构和核心问题·····	
第一节 当代帝国研究的结构·····	214
第二节 当代帝国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	218
 参考文献·····	 265

导 论

帝国研究的学术源流

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曾说：战争和暴力是人的普遍本性。^①它会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从而使得人类的生活变得“污秽、残忍而短暂”。^②“在人的本性中，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吵架。一是竞争；二是胆怯；三是荣耀。竞争会使人发动进攻而获利；胆怯会使人发动进攻而获得安全；对荣耀的寻求则是为了得到声望。竞争会驱使人使用暴力，使自己占有别人的人身、妻子、后代和牲畜；胆怯会驱使人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对荣耀的寻求会驱使人为了琐碎小事而争斗，如一个措词、一个微笑、一种不同的意见，或其他没有多少价值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直接关于他们自己的，或是反映在他们的亲人、朋友、国家、职业或名字上的。”^③为了终结人性这样混乱的状态，霍布斯提出应该由“利维坦”——即一种共同的力量——来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没有这种安全则任何社会生活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社会秩序的维系是遵循这样的规律的话，那么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是否也需要一个类似的国际“利维坦”呢？帝国就常常被视为国际层面的“利维坦”。^④

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帝国，纵观整个历史，曾经有很多人是生活在帝国的统治之下。^⑤自从帝国出现后，历史学家就一直对帝国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有的是出于对过去的帝国荣光的缅怀，有的是为了探索争霸的动因，还有的则比较关注殖民统治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冷战结束后的最近十多年来，在欧美学界帝国研究又一

次兴起,并呈现出与传统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研究相当不同的面貌,“帝国研究”(Empire Studies)也逐渐地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各大帝国陆续走向分崩离析,学者们多数认为民族国家是从帝国过渡到国家的必然产物,并且是现代的主要政治实体。冷战结束后,“殖民与全球化两大论题,取代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的位置,俨然成为英语世界的显学。”这两大论题得以快速浮现的历史条件在于“冷战结束后,欧美地区左右对立的结构性区隔被拔除,这使得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被压抑的前期殖民历史关系重新搬上台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运动在扫除社会主义抗拒的路障后,以资本为前导的全球化运动全面性地展开”^⑥。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感觉结构中,“向后看的后殖民论述与向前看的全球化话语共同将重要的‘帝国(主义)’推到边缘位置,造成对于当前的世界缺乏解释力”^⑦。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随着最近几年来欧美学界对帝国问题的重新关注,学者们试图脱离以往对民族国家的过分关注,将重点转向新的全球权力形式上来,帝国问题被重新摆在辩论的核心位置。^⑧但是,这是一种新的批判性的介入,在论述的过程中“帝国”一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书将这一类的研究称为冷战后的新的帝国研究。本书所要关注的便是冷战结束后至今十多年来欧美学界帝国研究的最新状况,通过对其代表作品的分析,试图了解西方学者如何从他们身处的地理空间出发,从帝国研究的角度来理解当今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以美国单一霸权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格局的现状和将来。

要理解冷战后的帝国研究,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帝国研究的学术史中。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致可以把关于帝国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20 世纪之前的帝国研究可以归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关于帝国的研究和评论是比较零星、不成系统的。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60 年代,可称为帝国主义理论时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围绕“帝国主义”的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并且形成了一些有一定系统的学

说。第三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可称为当代的帝国研究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大帝国相继解体,加上后殖民主义及新历史主义的推动和影响,帝国研究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第四阶段即冷战结束后至今,即本书所关注的冷战后的帝国研究。下面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地按时间顺序追溯这四个阶段中帝国研究的历史源流。^⑨

一、20 世纪前:早期的帝国研究

在 20 世纪以前,对帝国的研究和评论都是比较零星的,既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也没有出现群体的辩论,只是在一些作者的作品中偶尔被提及。最早对帝国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的是启蒙运动晚期的思想家领袖们。他们对后来被定义为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现象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对帝国进行了谴责,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认为,帝国主要是亚洲的概念,适用于它的辽阔面积和亚洲人的顺服精神。孟德斯鸠从两方面对帝国进行了批判,首先是针对普世性的君主政体的殖民系统。他指出:国土辽阔的殖民帝国不可能进行民主的治理,帝国主义是自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罗马本是一个自治的共和城邦,领土扩张不可避免地使它变成了一个专制帝国。此外,孟德斯鸠认为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殖民经济在道德上也应受到谴责。

伟大的帝国必然需要独裁的政权来统治,因为它需要迅速地做出决定以弥补传达决定所需跨越的长远距离,要有畏惧感来控制远方的统治者和长官,以及要有唯一的首脑制定法律来应付一个国家由于幅员辽阔而倍增的偶然事件。没有这些保证,君主国就会分裂成许多部分和国家,它们从被认为是外来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开始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⑩

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间,帝国主义思想逐渐强大起来,也推动了新重商主义和保护思想重新抬头。人们强调以任何方式对欧洲以外的